

王殿卿 著

●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

下

王殿卿 著

德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六 儒学与西方现代文明

读马克斯·韦伯的两部书	(3)
利玛窦的贡献	
利玛窦来华传教经历简考	(11)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利玛窦	(22)
利玛窦——欧洲汉学家的始祖	(33)
儒学与西方近代文明	
中国古代儒学与西方近代文明	(41)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60)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68)
21 世纪人类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对话	(85)

七 文化反思与文明对话

文化反思与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101)
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	(112)
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	(129)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	(136)
中埃文明对话	
· 埃中古代文明对话	(140)
埃及行	(144)
中埃古代文明对话特稿	(150)

八 儒学与当代道德建设

东方伦理

东方的世纪与东亚价值观	(155)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170)
东方伦理与青少年思想道德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172)

儒学的当代价值

儒学在中国复兴中的新定位	(178)
2002 年“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185)
儒学与当代道德建设	(189)
儒家伦理与政治文明	(202)

儒家伦理与道德教育

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道德教育	(212)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弘道明德十周年	(225)

九 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主要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	(245)
当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256)
中国的年文化	(262)
传统美德教育之我见	(269)
《三字经》当代学校德育智慧之源	(271)

十 孔子及儒学的新生

孔子在当代

孔子 2550	(281)
孔子 2556	(286)
孔子 2557	(293)

儒学何以在生

从官方儒学到文化儒学	(302)
历史 文化 责任	(307)
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 (摘要)	(314)
当代儒学及孔子何以再生	(324)
——为纪念孔子诞辰 2557 年而做	
冲突与和合	(341)

儒学走向大众

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 (综述)	(348)
当代企业家的文化使命	(355)
创建尼山圣源书院的论证报告	(361)

十一 儒学在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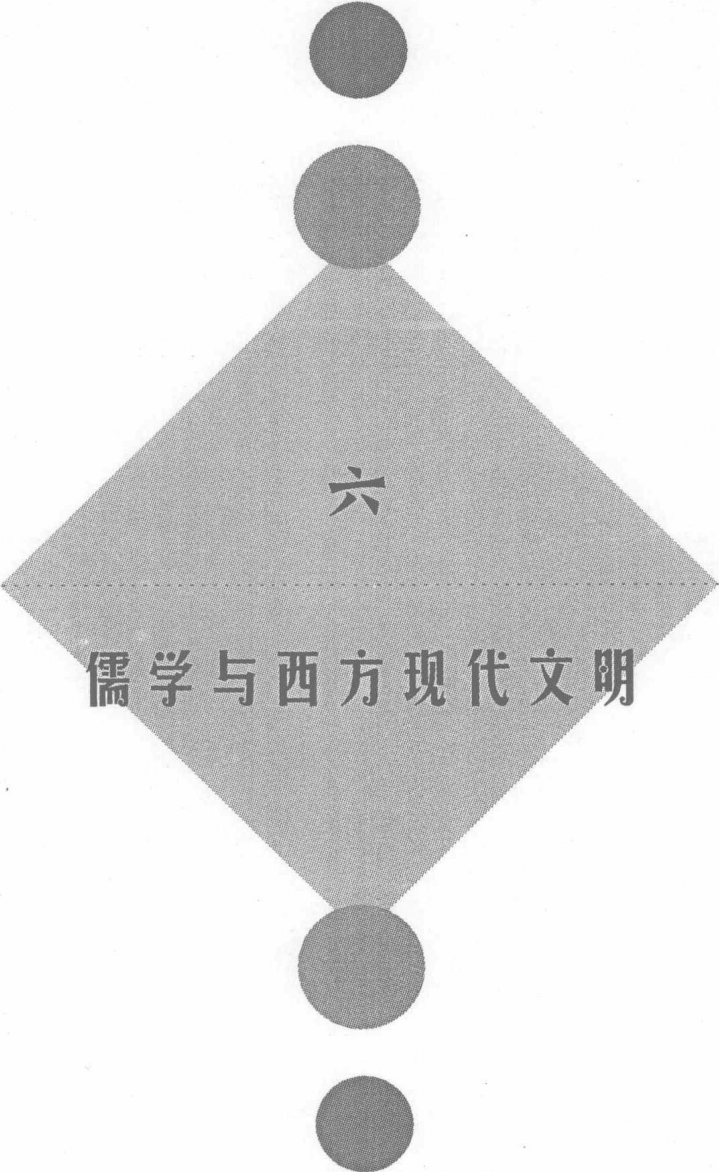
关于台湾的考察报告	(367)
台湾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	(376)
三去台湾	(383)

十二 儒学在韩国

韩国行	(401)
在韩国感受中国道德文化	(414)
三去韩国	(422)

附 录

1996 - 2006 年 22 次国内外学术研讨会 (1996 - 2006)	(434)
1997 - 2007 年科研成果目录	(446)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central gray diamond shape. Above the top vertex of the diamond are two solid black circles stacked vertically. Below the bottom vertex are also two solid black circles stacked vertically. The entire design is enclosed within a thin black rectangular border.

六

儒学与西方现代文明

读马克斯·韦伯的两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和《儒教和道教》札记

韦伯（1864 - 1920）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至本世纪初期的宗教社会学家。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把宗教思想、精神和伦理引向社会，用于社会、影响社会，并导致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使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企图使新教伦理这一资本主义的精神统治全世界，首先占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事实宣告：以韦伯为代表的这种“西方中心论”，是不能左右人类命运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早发表于1904和1905年，他在1920年去世前作了重要修改后汇成一集正式出版。他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在此书的导论中，从天文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医学、史学、政治学、法学、艺术、建筑学与建筑艺术、印刷技术、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其结论是，所有东方的成果，都不如或被西方后来的发展所超过。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作。

该书的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开头引用了美国早期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富兰克林（1706 - 1790）在1748年写的《给一个年轻商

人的忠告》和1736年写的《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一些必要提示》中的话：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消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当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

“切记，金钱具有孽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孽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来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能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们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家的钱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假如你是一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不只是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代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这些论点，是讲金钱伦理学，伦理成为获

得金钱的手段。“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只要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典型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精神。

德国的费迪南德·古恩伯格，曾经尖刻地讽刺过富兰克林：是要“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

16世纪马丁·路德进行了宗教改革，向中世纪罗马教廷长期经营的宗教秩序挑战。瑞士人加尔文（1509 - 1564）以复归《圣经》元精神为宗旨，创立了与罗马天主教相对抗的新教。由于他反对教俗领袖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节欲以自洁，因此得名“清教徒”。“清教精神”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韦伯肯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和生成的关系。

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因为“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的追求，是尘世间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所共有，它与资本主义不相干”。

按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伦理经济。而且这种经济制度是对一些人的金钱欲望与贪婪的一种限制。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1915年）两部书，是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资本主义？（前书的第15页）在这里他认为，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又自发的动力。他认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

新教中的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决定的。上帝赐予一部分人永恒的生命，也预先注定了一部

分人要永恒的死亡。（前书 75 页）教徒们要想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争得获救，求永生、免永死，必须拼命地劳动和有秩序地进行世俗活动。这种建立在“天职”基础上的“劳动精神”与合理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信奉加尔文教的工人，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把为雇主拼命劳动，作为受到神宠和解救的证据。新教伦理为雇主提供了一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劳动大军。

新教加尔文派的禁欲主义要求教徒，不许耗费财富，也不许让财富呆滞不用。这种“禁欲主义”为资本积累与生产性投资提供了可能。

以上两条新教伦理，一是勤劳，二是节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具体地表现为：（1）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达到其它的目的的手段。（2）勤奋是一种美德和一种道德义务。（3）强调纪律与控制。（4）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自由的劳动”。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使物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与精神（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从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该书的第二章，是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在这一章中，他说：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对此，该书的注释中，列了如下一个表：

1895 年巴登部分学校中学生的宗教构成

	新教徒 (%)	天主教徒 (%)	犹太人 (%)
高级文科中学	43	46	9.5
实科中学	69	31	9
理科中学	52	41	7
中 学	49	40	11
高级市立中学	51	37	12
平 均	48	42	10

这个表中的数字表明：中学里的教徒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前两项之和占学生总数的 90%。这就是说，在未来的劳动大军中有 90% 的人，要按照上帝的“天职”去劳动和节约。使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全民性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韦伯在讲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时，是讲精神促进了物质的发展；在讲儒教与道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时，则是讲精神阻碍了物质的发展。这是讲，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用西方的新教伦理取代东方的儒教和道教，或者用西方的新教伦理改造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或者按照西方的新教伦理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进行改革。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中国到处建立起来的天主教堂，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然而，两个世纪过去了，新教伦理没有取代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国没有变成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的理论在中国不适用。近百年来来的东方，尤其是东亚的社会现代化，也历史地宣告了韦伯理论的破产。

在西方，韦伯的名字与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1859 - 191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神明。

韦伯的思想受到过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他说过，“谁要是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他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那么他就是在自欺欺人”。他在1885年就读哥廷根大学时，就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卷，189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阅读了《资本论》第三卷，1903年他阅读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这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事情。如果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那么，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多少人像韦伯那样通读过《资本论》一、二、三卷呢？在今天，如果有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整天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连《资本论》都没有见过，“那么他也就是在自欺欺人”。高喊马克思主义，而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困境。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新教伦理的成分，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他所生长的那个历史年代，所盛行的新教伦理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体系，作为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中国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某些新教伦理与儒教和道教伦理精华的结合。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使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进而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已经早有定论。但是，除了这三个来源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来源？尤其是有没有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教义中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尽管这是个禁区。马克思对西方的宗教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不能说他没有吸收过西方宗教思想中的精华，否则，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文化根基的。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进行过

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说明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都要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相结合。也只有外来思想文化的精华与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更加优秀的思想文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都是这样整合而成的。

西方对中国进行了上百年的文化侵略，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成千上万座天主教堂，给中国派来了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企图给中国人的头脑中输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帮助”中国这块殖民地，实现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

据历史记载，在康熙年间，全国有 28 个城市建立了天主教堂，有教徒十几万人。另据不完全统计，1900 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 886 人，1930 年增至 2 038 人，至 1949 年已增至 5 346 人，教区有 140 个，教会 98 个，教堂 15 000 座。

新教传教士自 1870 年马礼逊入广州开始，到 1840 年一共只有 20 人，到了 1853 增至 618 人，1926 年增至 8 352 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848 年到 1868 年的二十年间，中国政府就有 21 次向西方在中国的教会进行“教案培款”。（见《国耻愤》一书第 282 ~ 283 页）

可见，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他们的目的之“高尚”，以及延续的时间之长，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文化侵略失败了。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始终没有、也难有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包括那些有价值的外来文化，如果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很难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很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由于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所以，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

今天来看，韦伯对中国的研究，尽管他的立场是站在西方看东

方，以西方的价值标准评判天下的是非，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他的一些观点、包括他的错误结论，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

从韦伯这里，可以找到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也可以找到当今美国顽固坚持“美国中心论”的历史依据。还可以找到近百年来，中国人看不起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殖民地意识，一直演变到当今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脉络与渊源。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影响，从殖民地意识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才算真正挺直了自己思想文化的脊梁！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才能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是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面对 21 世纪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补充资料：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的第二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中，分析了“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有可能从中国当时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但是，确实又没有发展出来，“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

可见，他也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未能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封建制度。

▲1996 年 2 月 10 日

利玛窦的贡献

玛窦来华传教经历简考

今年，澳门即将回归，研究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已经提到日程，而研究利玛窦的贡献，应是此项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一次传播是在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即 627 - 649 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从波斯到中国传教，被称为景教。

第二次传播是景教在元朝（1271 - 1368）的复兴和罗马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其影响只在蒙古族当中，因此，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

第三次是明清之际，16 世纪末到 1789 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第四次是 1840 年之后的传教，这是在列强侵华的枪炮声中进行的。

利玛窦来华传教，属于第三次。

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是同天主教会的传道结成联盟的。

1549 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来到日本传教，从日本获得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风俗、习惯。他发现，日本人用中国的经典为依据反对基督教的传播，因为“日本人在智慧和一切知识方面，都尊中国人于首位，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行政事务上”。于是，他得出结论：基督教必须进攻中国，一旦中国皈依了，日本就会步其后尘。1551 年他从日本回印度的果阿，中途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逗留，